

文化转向：大学毕业生城市流动的新逻辑

吴志明 马秀莲

(英属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学系 国家行政学院社会科学部)

[摘要] 西方城市人口增长的文献在过去几十年间经历了“文化转向”：工作就业等经济因素让位于文化休闲等消费因素成为人口流动的主要吸引力。城市人口流动的“文化转向”在中国同样明显，尤其表现在大学毕业生群体当中。城市在大学毕业生眼中已经不再是简单的工作地点。城市是学习机器，是娱乐机器，越来越多的大学毕业生在城市流动选择中追求价值实现，表达自我，体验生活和分享梦想。青年大学毕业生是城市人口流动最活跃的群体。他们的城市流动目的地选择直接影响到城市社会、文化经济的发展。

[关键词] 大学毕业生；城市人口流动；文化转向

[中图分类号] G64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1789(2015)01-0088-06

什么因素影响青年大学生的流动选择？经典的答案是工作机会和生活成本的高低。但是越来越多的学者意识到经济因素在城市增长中已经开始失去主导作用。同时，中国的大城市生活成本高，大学生失业严重的事实也告诉我们，工作机会、生活成本等经济因素也许并不是左右年轻人流动选择的首要因素。西方城市人口增长的文献在过去几十年间经历了“文化转向”：工作就业等经济因素让位于文化休闲等消费因素成为人口流动的主要吸引力。

本文采用质性的半结构访谈方式初步验证了城市人口流动的“文化转向(cultural turn)”在中国同样明显，尤其表现在大学毕业生群体当中。工作或是单纯的经济元素并不是年轻人流动的唯一甚至首要目的，年轻人赋予流动更多的社会文化意义。城市在中国年轻群体眼中已经不是简单的工作地点，城市是学习机器，是娱乐机器。越来越多的中国年轻人在城市流动选择中追求价值实现，表达自我，体验生活，分享梦想。大学毕业生群体作为当代中国人口流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城市人口流动最活跃的群体，他们

[收稿日期] 2014-12-10

[基金项目] 本文系首都师范大学文化研究院“后工业城市运用文化经济转型失败案例研究”课题的阶段成果，课题编号：ICS-2014-B-09；国家社科基金西部项目“内地西藏班教育成效及其对西藏教育发展影响研究”，课题编号：11XMZ040。

[作者简介] 吴志明，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学系，主要研究方向为城市流动增长；马秀莲，国家行政学院社会科学部，主要研究方向为比较社会学。

的城市流动目的地选择直接影响到城市社会、文化、经济的发展。本研究呈现的年轻流动人口流动选择的影响因素，对城市吸引人才、提高城市人力资本、进一步的发展实践具有很强的指导性意义。

一、研究背景

传统的城市增长理论可以追溯到马克思与韦伯，他们都强调城市增长是工业化和地方经济发展的结果。因此人口往城市流动主要是受到工作机会和生活成本高低的影响。但是在后工业时代，越来越多的学者意识到经济物质因素在城市增长中已经开始失去主导作用。^[1] Clark 也反复强调传统城市增长模式已经过时。^[2] 确实，在近几十年来的城市增长文献中，城市经济的增长已经不是简单的城市化过程，更多是强调人口增长动力。这一城市增长理论的主要逻辑是：人力资源的空间分布是由每个个体自由偏好选择的结果；这种自由偏好选择更多地强调城市空间质量，而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城市所能提供的娱乐休闲环境；不同人群对不同种类的娱乐休闲环境作出选择并决定迁移到相关城市，最终带来城市的不同增长模式；那些能够吸引高人力资本人群的城市能够获得更快速的经济增长，因为这些流入的高人力资本人群是城市经济增长的发动机；而在强调后物质主义的今天，那些高人力资本和创新群体往往都会倾向于选择迁移到具有丰富娱乐休闲环境的城市。^[3] 虽然，城市公共环境在古代城市的奥林匹克运动会和类似的大型集会时便出现了，但是基本上没有被纳入城市增长领域的研究中来。近年来，城市公共环境渐渐地吸引了大量城市研究者的兴趣，关注度比较集中于如城市中的大型聚会、城市建筑设计和城市旅游吸引力等。

这个日益流行的城市增长理论可以进一步分为三个主要派别：一是 Florida 的创新阶层理论。Florida 强调吸引和留住创新人群是城市经济增长的基础动力。^{[4][5][6]} 他分析道，创新人群的出现可以增强城市的创新能力，而创新能力可以帮助城市创新经济的发展，特别是高科技部门的增长和扩展。具有科学技术、包容度和天赋的创新阶级聚集在一起，他们的相互交流、互相认同给城市营造了一个独特的增长环境。总之，城市地区的发展越来越和产生、吸引和留住高级知识分子的能力联系在一起。二是 Glaeser 等人强调的一系列的社会与自然的娱乐休闲环境对人力资本的吸引。Glaeser 等提到技术和自然气候的环境是城市增长最为主要的两个因素。知识经济的发展，全球化和创新网络的建构已经把传统城市变成了“智慧城市”。^[7] 智慧城市用科技与沟通给市民带来了更多的竞争、更多的创新观念和学习机会，从而使城市人口集聚现象更加明显。^[8] 事实上，如果在城市里面没有相互学习交流和提高自己的知识能力的机会，很少有人愿意去承担高房租在城市工作。人力资本的集聚可以推动城市生活质量的提高，从而吸引更多的人口集聚。^[9] 另外，自然气候环境也在其中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人力资本高的城市同时也是比较适合居住的地方。城市已然变成了一个以“消费”为导向的增长模式。^[10] 三是 Clark 的城市作为娱乐机器的理论。Clark 认为人力资本模式是不完整的，一方面，并没有解释人力资本最初在哪里集聚，为什么在那里聚集起来；同时人力资本强调的人口增长，主要是指推动创新性人才、高级知识分子、年轻人等的流动。然而，公共环境对不同的人群都会发生作用。^[11] Clark 认为，有些公共物品会影响到城市里的每一个人，比如说清新的空气。有些人喜欢多样化，而有些人喜欢同质性。对于创造性阶层来说，城市的多样化和包容性是他们主要关心的；另外一些人则更喜欢同质性，他们认为相同文化的城市社区更有利于孩子的教育，更加安全。优越的自然环境，比如适当的气温以及漂亮的山水风光可能吸引更多的老年人；但是建筑环境，比如戏剧院、酒吧和博物馆会更多地吸引大学毕业生。因此不同的公共环境对于不同的人群具有不同的吸引力。但是总体来说，城市公共环境对于每一个人来说都会有不同程度的影响。^[12]

在此基础上，Silver 和 Clark 又进一步提出了城市场景理论。城市场景理论认为文化的概念太过于宽泛。城市文化是指传统高雅的戏剧。莎士比亚剧场、经典的交响乐呢？还是地方的、真实的文化？比如芝加哥的蓝调和加州的野炊文化是完全不一样的。文化是创新实验性，比如前卫的艺术展，先进的剧场和奇怪的建筑呢？还是街道市民文化、农场普通生活？或是自行车道或是简单的手工艺？应该发展那一种文化好呢？这些在那些政策制定者面前都是模糊的，更不用说不同的阶级、不同的种族、不同的性别对文化的偏好不一样。城市场景理论综合劳动力、生产和消费来解释城市增长。这样就可以避免单方面解释所产生的偏见。场景可以把消费组织成有意义的社会活动，不是简单地研究消费，而是研究消费的社会结构。城市不是简单提供货物的地方，而是提供公共环境，并组合成有意义的生活文化体验的地方。因此可以

探究不同的消费者对不同城市公共环境的不一致追求。只有这样我们才知道城市公共环境、文化作为城市场景在城市发展、地区增长中的作用。城市场景还告诉我们只有消费者觉得有价值的环境才会去消费体验,消费者对于不同时空的环境作出的反应是不一致的。因此,城市对于流动者来说是一个综合体,流动者不会只单方面去考虑城市的某一个特点,流动者需要结合自身与城市的综合情况来作出流动选择。不同的流动者,在城市的选择过程中会表现出不同的倾向和偏好。^{[13][14][15]}

二、研究方法

在2011年2月初到4月底对37位大学毕业生(包括即将毕业的大学生、研究生)进行了访谈调查,了解他们的毕业选择。这段时间是高校大毕业生毕业季,他们准备选择工作地点和生活城市。到底在毕业踏入社会的时候,他们是以工作为中心,工作在哪里就流动到哪里呢?还是把城市当作首要的因素,然后在相应的城市里确定自己的工作?或是把工作和城市综合起来考虑,在各方面因素衡量的基础上作出决定?访谈对象分别来自北京、上海、深圳、广州、成都等大城市。笔者在访谈过程中,针对每一个个体都有追问相关的问题如家庭背景、学校背景和个人性格等对流动的影响。所有的访谈都以录音的形式先保存下来,再通过整理形成文字材料。

三、研究分析

(一) 城市作为学习机器

在中国的流动人口中,年轻群体也是占了其中最为重要的部分。为了弄清楚为什么年轻人的流动更加频繁。笔者在访谈的过程中有问及年龄因素是否和流动有关系。受访者的回答往往都是说年轻是流动的资本。年轻的时候应该出去闯,多学习,多积累,为以后做好准备。而大城市学习的机会多,资源丰富,是他们出去学习、考验自己的理想地方。“我觉得更多的是大城市的资源很丰富。从我的整个事业发展来说,大城市肯定机会更多,比如说在整个工作中,我参与的项目更多,项目的级别更高。如果就是说我年轻的时候多做这些工作,肯定对我的整个事业是有一个积累的。当我在以后要到二线的城市发展的时候,这些东西是我的优势,是我很好的平台。”(Yule, 24岁,上海)

在访谈过程中了解到,年轻群体或许并没有要把某一个城市当做自己固定的职业场所,这也许就是他们流动性强的一个原因。在他们眼里,城市是一个学习机器。在城市里面,学习机会多,锻炼机会多。同时他们认识到年轻的时候是积累知识,积累资本的最好时候。所以,趁年轻应该出去闯荡,出去学习。年轻是流动的资本,并且目的都是为以后的发展打下良好的基础。

教育是人力资本获得的首要途径,高等教育则是城市人力资本积累的最重要手段,因此我们可以简单地所高校多、大学生多的城市,其人力资本也较高。在调查中我们同样也发现,在青年毕业生城市选择中,他们也表现出喜欢到高校多、大学生多的城市工作。另一方面,青年大学生喜欢集聚在大城市,因此导致大城市高校多、名校多。我们从高考录取分数线的比较上就可以明显地看出这一点。比如,北京、上海、广州等一些大城市综合实力百名开外的普通本科学校,平均录取分数比其他城市的重点高校还高很多。无疑,大学所在城市在其中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人力资本在不同的人群中会表现出具体的差异。青年大学生群体明显都喜欢集聚在拥有较多高学历人群的大城市中。在这样的大城市里面,他们是其中的一分子,在与同伴群体交流互动中提高自己的见识,开阔自己的视野。而正是在这样的交流学习中,人们不断学习,不断积累自己的人力资本。当问及大城市高校多、大学生多是否会影响流动选择时,在北京工作了3年的Lvsha说到:“北京高校多,大学生多,我觉得这样挺好的。现在和我生活工作在一起的大部分都是大学生。和他们我更多东西可以聊,在聊天的过程中其实我可以学到很多东西。我自己是做媒体的,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上班,做的是学术性的杂志。在北京这样的大城市,找一个教授专家做访谈什么的很容易,因为大学很多。也正是这样,我喜欢这个城市,也喜欢这个工作,因为我可以感觉到这样不仅仅是工作,而且是一个学习的过程”。(Lvsha, 25, 北京)

(二) 城市作为娱乐机器

后工业社会里,城市增长模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城市文化的作用越来越凸显,消费、公共环境的作

用越来越大，人们更加强调城市效用和生活质量。消费和娱乐休闲成为了城市增长的新动力，城市已经由“增长机器 (growth machine)”转变成为了“娱乐机器 (entertainment machine)”。的确，在访谈的过程中，几乎很少的大学毕业生会把工作当作城市流动的首要考虑因素。他们往往是先确定城市，然后第二步才会想到在城市里面寻找适合自己的工作。他们开始越来越多地关注城市的文化环境、自然环境、生活质量等种种非物质的因素。

在访谈中很多年轻人提到，也是因为自己年轻，可以多尝试，多闯荡，赚钱已经不是他们的主要目的。他们也表示自己还年轻，比较容易受到城市新奇事物的吸引。特别是大城市发生的事情、城市新奇的建筑、城市各种不同地方来的人，比如北京、上海，可以经常看到来自不同国家的年轻人。这些多元的文化等都会对年轻人产生很大的吸引力。笔者已经明显感受到了这种后物质主义的倾向在当代中国年轻群体上的表现。“城市娱乐活动、生活也比较丰富。这些肯定会吸引，城市刺激物更多，对于年轻人来说吸引大一点，年纪大了以后可能会减弱些，但是对于我们这样的年纪应该会很感兴趣。”（Zhouhao, 24岁，北京）“我是看着香港粤语电影、听着粤语歌长大的80后，特别喜欢这种语言。虽然我不能说这是我来广州工作的决定性原因，但是想着去广州工作之后，我可以天天听到粤语，可以更快地学会粤语我就会很激动。现在我在这里工作，公交地铁都会用粤语报站名什么的，我都听得懂，因为自己爱听粤语歌。感觉很快融入到了这个城市，也越来越喜欢这个城市。”（Chenchao, 26岁，广州）

就城市总体公共环境来说，对于每一个人都会有不同程度的影响，但是具体不同的公共环境对于不同的人群具有不同的吸引力。有些人更喜欢北方的城市，有些人喜欢南方的城市，有些人喜欢海滨城市，而另外有些人会被内陆城市所吸引。他们都有着自己不同的选择原因。在访谈过程中，我们也发现男女性别特征对城市的流动选择也会有不同的影响。女性大学毕业生较多的会把离家距离远近当做城市选择的一个考虑因素。

中国年轻大学毕业生群体是高学历人群。教育水平越高的群体，他们参与各种活动的要求也越高。大城市里面发生的文化艺术活动、民主政治活动、爱好者集会等社团活动公共生活都相对多样和丰富。并且大城市人口密集，交通、网络媒体使用等方便快捷。这些东西虽然不是决定性地影响到年轻人的流动，但是却越来越成为年轻群体考虑的重要因素之一。“可能如果在北京，这种会明显一些，北京的活动，看歌剧、听音乐会呀，选择的余地会很大，电影市场比较便利，都是最新的，欣赏高雅音乐也、参加文艺活动呀，资源很多。对这方面需求比较高的人肯定更有吸引力。我选择的时候，深圳这方面在国内来说，这也是发展比较好的，经济特区嘛，文化也在发展，基础设施相对比较完善，也是我考虑的因素。”（Fangyan, 26岁，深圳）“我在济南山东大学上的本科，大学的时候我参加了很多社区活动、公益活动。因此在选择城市的时候潜意识会有考虑城市的活动。比如在济南，这些娱乐化的东西肯定没有比北京好。所以我考研生的时候，北京、广州和上海会是我的选择城市。因为这些地方经常性地举办国家的或国际性质的大型活动。”（Laiweijun, 24岁，北京）

城市第三部门，或是公益社团比较集中。年轻群体在休闲时间也会积极参与这些公益活动。比如参加城市各种社团活动。年轻人流动反应了他们对于生活方式的选择，对于文化偏好的选择，甚至是对政治的看法和展望。他们急于重新定位自己的社会地位。通过参加政治活动，年轻个体可以满足他们的政治兴趣以及和同龄人分享自己的政治观点，同时也通过参加这些活动来增强自己的公民身份感。“我平常时候比较关注政治新闻和发生的政治事件，比如说一些政治活动呀，在大城市这种东西会更多，而且了解的渠道也会比较多。比如去年的时候日本的钓鱼岛事件，我有去参加春熙路和天府广场附近的抵制日货活动。我们集聚在伊藤洋华堂门口，很多年轻人参加，很刺激。我不敢说我这样做就是爱国，但是至少这是表达我自己的一种方式。而且参加的人都是年轻人，年轻人就应该多关注这些事件。”（Chenwei, 26岁，成都）

（三）城市作为价值实现的地方

城市场景理论认为，城市在年轻人眼中既不是单纯居住或是工作的地方，他们是站在消费者的角度来看的。如何打发时间、如何消费和体验生活是关注的焦点。城市不仅仅是生活工作的地方，而且是休闲、玩乐，追求梦想，体验生活的地方。年轻人当他去某一个城市工作的时候，他会往往把自己作为城市的一部分并为之感动骄傲。当城市里面发生了重大的事件，他们总会把这个事件和自己联系起来，或是和外地

的朋友、家乡的亲人讲述分享城市发生的重大活动。他们也乐意听到别人讨论自己所在的城市或是对自己所在的城市感兴趣。“厦门发生一些比较大的城市活动的时候,比如国际马拉松赛事的时候,我会很激动。我去报名当志愿者,或是去观看。比如北京奥运会的时候火炬传递,在其他城市传递的时候没有多大的感觉,但是到厦门的时候,我就很激动,把公交车门都挤破了去看。我在厦门工作,然后厦门有一些全国甚至是全世界都是很著名的景点,比如鼓浪屿呀、普陀寺等。我会和朋友父母等介绍,然后会邀请我的父母和同学来这里玩,我陪着他们玩有主人公的感觉,会很高兴很骄傲。”(Maoqianqian, 22岁,厦门)

“当城市里面发生了大型活动,肯定潜意识里面会有一种优越感。对吧,肯定会有。假如我在北京,然后在这比边奥运会。而你虽然嘴上可能会挂着,抱怨,哎呀,奥运会,那么多人。你不觉得,其实你心里自然都会有一种优越感,会很骄傲,因为你住的地方会有很多人跑过来看,我住的地方是一个大城市,我住的地方是一个国际化的大都市。我会有这种感觉呀。”(Liuxi, 23岁,武汉)

后物质主义的年轻人在乎自己有个性的表达方式,同时也在乎别人观看他们的方式。在他们眼里,城市是他们表达自己、实现理想的地方。比如说,北京的798艺术区,这里集聚了那么多的年轻人,其实他们集聚在这里不是简单地为了经济上的利益。这些年轻的个体集聚在一起,分享他们的艺术创作,表达自己的生活观点。而且因为吸引了很多游客来观看他们,使他们感到骄傲,感到与众不同,城市是他们的梦工厂。这便是为什么798艺术社区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集聚的主要原因。

同时年轻人会把在大城市工作当作自己的身份标志,就像每一个人开的车可以外显自己的身份一样。他们把大城市的生活工作,甚至旅游经历当作自己的一个优势背景。回到老家他们也乐意介绍自己是从哪个大城市回来的。虽然他们也认识到这是一个互动建构的过程,但是在年轻人身上是具有重大意义的。他们喜欢听到别人的赞赏,喜欢把城市和自己联系起来。他们也同样希望成为大城市的一员。当问及向别人介绍自己的时候,说是大城市,比如在北京、上海工作,会不会有一种优越感。Laiweijun回答道:“有微妙的感觉。这个东西是一个互动的过程,我就觉得。比如说,你自己你说你在北京上学,然后别人觉得,哦,你在首都上学,首先别人有这样的一个心理作用。那这个时候,你心理也会有这样的暗示作用。就是一个互动的过程,相互建构的过程。比如我回赣州,回南昌的话,跟别人讲你在北京上学工作,人家就会觉得,哎,北京,首都,觉得你很了不起。”(Laiweijun, 24岁,北京)

Liuxi也同样说道:“比如说,我是从县城来的,那你觉得,如果我以后留在北京和留在武汉,家里周围的人,邻居看你的眼光就会不一样。他们会说,哎,他们家有人在北京工作,这一听,别说你在北京工作什么,收入多少。他们就不在乎,哦,北京人哦,首都人,一听就会哦,北京还有奥运会,北京还有故宫、长城。这一听确实就不错。”(Liuxi, 23岁,武汉)

他们意识到了这种社会建构的意义。当他们回到小城市,或是农村地区的时候,别人对大城市工作的人的赞许目光在他们身上形成了积极的动力,即使在大城市工作艰苦,他们也愿意承担并持续下去。后物质主义价值观明显的年轻群体喜欢把城市形象和自己微小的存在联系起来。城市已然成为了年轻群体的一张身份名片。

四、结论与讨论

中国年轻高学历群体作为后物质主义者群体的主体,他们在流动过程中的城市选择已经不是关注工作等物质经济因素,更多的是考虑城市环境质量、生活节奏、包容开放度、休闲娱乐活动和城市实现自己目标的能力等非物质的因素。在访谈的回答者中,几乎所有的受访者都认为在寻找工作的时候,城市是首先考虑的对象,或是把城市和工作综合起来考虑。在访谈分析当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工作或是单纯的经济元素并不是年轻人流动的唯一甚至主要目的。城市在年轻群体眼中已经不是简单的工作地点,而且是他们娱乐休闲、参与公共活动、体验生活、追求梦想的地方。他们越来越多综合考虑城市的各个特点后作出流动的选择。城市年轻的、受教育高的人群密集,丰富的人力资本以及城市公园、剧院、水吧等公共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都是吸引年轻人到大城市的重要考虑因素。因此,无论是人力资本理论,还是城市公共环境理论都在中国年轻人口流动中寻找得到足够的证据。城市是学习机器,是娱乐机器。年轻人赋予流动更多的社会意义,流动并不是简单的生活工作学习的地点更换,更多的是把流动当作一种生活方式。随着全

全球化的深入，和世界其他地方一样，越来越多的中国年轻人在城市流动选择中追求价值实现，表达自我，体验生活，分享梦想。城市是年轻人的舞台，在城市的舞台里，他们实现自我价值，参与城市活动，甚至把城市当作自己的一张身份名片。因此城市场景理论在中国城市人口增长中同样具有很强的解释力。同时，从访谈者的回答资料中，我们又发现了更多的收获。中国有着特殊的国情背景和文化传统，在西方概念下总是难以足够理解的。中国年轻人城市流动有着复杂的情结。年轻人在城市的选择过程中除了受人力资本、城市资源丰富、机会多等相对经济方面的因素影响外，亲人圈、朋友圈等形成的社会网络，并由此可预计的社会资本也在同时主导着年轻人的流动选择。

参考文献

- [1] Berry, B. J. L., et al. Geographic perspectives on urban systems: with integrated readings, Prentice Hall. 1970.
- [2] Clark, T. N., et al. Amenities drive urban growth. Journal of urban affairs, 2002(5): 493-515.
- [3] Storper, M. and A. J. Scott (2009). Rethinking human capital, creativity and urban growth. Journal of economic geography, 2009(2): 147-167.
- [4] Florida, R. The economic geography of talent. 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2002(4): 743-755.
- [5] Florida, R. The rise of the creative class and how it's transforming work, leisure, community and everyday life (Paperback Ed.), 2004.
- [6] Florida, R. L. Cities and the creative class. Psychology Press, 2005.
- [7] Glaeser, E. L., Saiz, A., Burtless, G., & Strange, W. C.. The rise of the skilled city [with comments]. Brookings-Wharton Papers on Urban Affairs, 2004: 47-105.
- [8] Glaeser, E. L. The new economics of urban and regional growth. The Oxford handbook of economic geography, 2001: 83-98.
- [9] Glaeser, E. L., et al. Consumer city. Journal of economic geography, 2001(1): 27-50.
- [10] Glaeser, E. L., et al. Economic growth in a cross-section of cities.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1995(1): 117-143.
- [11] Clark, T. N., Lloyd, R., Wong, K. K., & Jain, P.. Amenities drive urban growth. Journal of urban affairs, 2002(5): 493-515.
- [12] Clark, T. N. Urban amenities: Lakes, opera, and juice bars: Do they drive development?. Research in Urban Policy 2003(9): 103-140.
- [13] Silver, D., Clark, T. N., & Yanez, C. J. N.. Scenes: Social context in an age of contingency. Social Forces, 2010 (5): 2293-2324.
- [14] Silver, D., & Clark, T. N.. Buzz as an urban resource. Canadian Journal of Sociology, 2013 (1): 1-32.
- [15] Clark, T. N. (Ed.). Can Tocqueville Karaoke? Global Contrasts of Citizen Participation, the Arts and Development (Vol. 11). Emerald Group Publishing, 2014.

Cultural Turn: The New Logic of Urban Migration among Young University Graduates

Cary Wu Ma Xiulian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Social Science Division, Chinese Academy of Governance)

Abstract: The last few decades have seen a “cultural turn” in western literature on urban migration: job and economic related factors become less important and culture related consumption factors become more and more important in attracting new migrants. Using a qualitative approach, semi-structured interview, this article shows that China is also undergoing the “cultural turn” in urban migration: more and more people make their city choices based on cultural factors rather than economic factors, young university graduates in particular. For university graduates, the city is a learning machine, an entertainment machine and they choose to stay in big cities after graduation because they adapt to urban lifestyle. They participate in city activities, express themselves among peer groups and pursue individual urban dreams. They want to be part of great cities. Young graduates as creative classes, understanding their migration logic helps improve the city attractiveness and then promote further development.

Key words: University Graduates; Urban Migration; Cultural Turn

责任编辑 裘晓兰